跨國婚姻家庭文化與語言學習不對等現象 之探討

葉郁菁*

摘要

早期的語言發展是兒童學習與教育成就的重要關鍵，但國內有關跨國婚姻子女語言學習的研究論述，則以「文化不利」泛指跨國婚姻子女的學習，我們期待東南亞跨國婚姻者識字、學習適應臺灣文化，但卻很少要求歐美國家的跨國婚姻者也要學習識字。歐美國家的跨國婚姻者在家庭中使用英語，他們對臺灣文化的了解程度也有限，但是我們卻很少質疑其子女可能會有文化不利或學習不利的問題。本文首先指出「跨國婚姻」概念應更為精確化，不僅東南亞和大陸配偶，也應涵蓋歐美等國家的跨國婚姻類型。其次，作者探討跨國婚姻家庭中語言學習的不對等現象，跨國婚姻家庭使用的語言是社會生活中權力關係的反映、一種不對等的現象。兩類跨國婚姻家庭的落差，呈現了兩種語言在臺灣社會中的不對等關係。第三，跨國婚姻家庭子女經常被類屬於「文化不利」，文化不利是從臺灣做為支配或主流文化社會的角度看待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子女，但是我們卻很少視歐美國家等跨國婚姻子女為文化不利者。若我們可以覺察語言和文化的不對等現象，就可以反思語言和文化不對等之下的不合理現象，進而肯定東南亞語言和文化學習經驗的重要性。

關鍵詞：文化不對等、語言學習、跨國婚姻

*葉郁菁，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電子郵件：ycyeh@mail.ncyu.edu.tw

來稿日期：2010年5月19日；修訂日期：2010年7月28日；採用日期：2010年12月6日

The Inequity of Culture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mong Cross-National Marriage Families

Yu Ching Yeh*

Abstract

Early language acquisition is a key factor impacting children's learning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he statements of young children's language learning from cross-national marriages normally lea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children from cross-national marriages are “culturally disadvantaged”. The cross-national marriage immigrants from South-East Asia are expected to learn Chinese and to merge into local Taiwanese cultures; however, the cross-national marriage immigrants from Europe and the USA are seldom under such expectation. English often serves as the dominant language in the cross-national marriage families and their children are rarely suspected of suffering cultural or language disadvantages. The researcher suggests the discussion of cultural and language inequality shall take both types of cross-national marriages into consideration. First of all, the researcher modifies the definition of “cross-national marriage” to include cross-national marriages from Europe and the USA. Secondly, the language policy in the cross-national marriages is considered a representation of power relationship within social life. The inequality of language use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of both languages in Taiwan. Thirdly, the researcher points to the phenomenon that children from South-East Asian cross-national marriage are perceived as culturally disadvantaged but not for the children from European or American cross-national marriages. If we can identify the cultural and language inequality in the cross-national marriage families and reflect the unequal phenomenon, we would be able to appreciate the importance of their languages and cultural experiences.

Keywords: inequality of culture, language acquisition, cross-national marriage

* Yu Ching Yeh, Associate Professor & Head, Depart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E-mail: ycyeh@mail.ncyu.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May 19, 2010; Modified: July 28, 2010; Accepted: December 6, 2010

壹、前言

教育被視為改變既有不利現況的途徑，藉由獲致均等的教育機會，運用適當的政策支持和介入，協助文化不利學童進行有效的學習，才能增加文化不利學童的教育資本，解決貧窮惡性循環的問題。因此，英美等國家針對弱勢家庭與移民家庭子女，提出早期的語言介入計畫，希望透過閱讀與鼓勵移民家長參與子女學習，增強學童語言能力，提升移民家庭子女的學習成就。英國「穩固開始」（Sure Start）計畫源起於美國在1960、1970年代盛行的啟蒙計畫（Head Start）¹與迎頭趕上計畫（Even Start）計畫，早期語言介入的成效，導致美國政府積極投入推動這些計畫（葉郁菁，2006）。英國學前階段早期的語言介入已經獲得證實，足以改善不利地區兒童的語言能力，其中最為重要的即為「穩固開始計畫」的實施（Pickstone, Hannon, & Fox, 2002）。此計畫協助教育不利的兒童在學前階段即可透過教育資源的介入，使得這些兒童進入國小之後，可以順利銜接並與其他兒童的能力並駕齊驅。

語言發展的確為影響兒童學習的重要因素，但是跨國婚姻家庭子女是否皆為語言學習不利則有待商榷。作者認為，跨國婚姻子女若在語言學習方面表現不佳，究竟是家庭社經因素的影響、抑或東南亞或大陸母親語言和識字能力造成學童語言學習的影響，國內碩博士論文大多探討跨國婚姻子女的學習情況與母親國籍的研究，許多結果在歸因的推導上過於簡化。例如，蔡旻芳（2009）以台南縣國小四到六年級學童為受試對象，分別施予「學童學習適應量表」，研究結果指出本國籍子女學習適應優於跨國婚姻子女，在未控制類似家庭背景的狀況下，作者結論母親國籍對學習適應有顯著影響。又如聞遠苓（2010）以問卷調查台中縣市360位越南與印尼配偶，研究結果指出跨國婚姻的家長參與子女學習程度較低，該研究同樣沒有本籍的對照樣本。陳曉琴（2008）以400位馬祖地區的一到六年級國小學童，進行學習適應與學業成就的問卷調查，結果發現馬祖地區跨國婚姻子女的學習適應尚稱良好，學業成就則呈現弱勢現象；跨國婚姻子女的學習適應和學業成就均顯著低於本籍配偶子女，但是該研究同樣未控制社經背景的影響。其次，英美等國家以語言提早介入做為協助弱勢和移民家庭子女的策略，不過上述國家所謂的「移民」，仍限於來自經濟落後國家的少數民族。以英國為例，上述計畫協助的對象為加

¹Head Start自1965年開始實施以來，即是一協助低社經地位（low socio-economic status, LSES）家長與兒童的綜合性發展畫（Hammer, Farkas, & Maczuga, 2010）。

勒比海黑人 (black Caribbean)、非洲黑人 (black African)、巴基斯坦、印度、中國 (包含香港和臺灣) 等國家的移民、甚至近年來比例略有增加的東歐新興國家白人移民。依據英國研究報告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2003) 指出, 即使在移民族群中, 仍有種族的差異性。例如, 印度與中國學生的學業成就表現, 並不遜色於英國學生。因此國內對跨國婚姻子女學習表現論述應該更為精準。

國內談述跨國婚姻子女文化不利和語言學習的問題, 大多基於將「跨國婚姻」設限在東南亞或大陸籍的婚配類型所做的討論, 這些結論的確反映國內跨國婚姻的多數常態, 不過卻忽略跨國婚姻的全貌。跨國婚姻的型態, 除了東南亞與大陸配偶的移民家庭外, 還包括歐美等國家的婚配類型, 因此在跨國婚姻子女語言和文化學習的討論, 應該涵蓋中文、越南語、甚至英(美)語。語言和文化學習背後隱含的支配文化 (dominant culture) 與被支配文化 (subordinate culture) 的意識形態, 更應該被凸顯和納入討論, 才能完整的呈現跨國婚姻中文化和語言學習的不對等狀態。

本文首先將先對「跨國婚姻」概念再加以精確化。「外籍配偶」、「跨國婚姻」、「移民」等詞涵蓋的內容各有不同, 在外籍配偶相關研究的論述上應更為精準化。因此作者將先從上述三個名詞做界定和區隔; 其次, 本文將依循上述脈絡, 論述兩項議題:

第一, 語言習得的不對等現象: 跨國婚姻家庭使用的主要語言並非全部都是國語或台語, 事實上許多歐美國家的跨國婚姻子女是以英語為主要語言。因此若將跨國婚姻子女稱述為「語言發展不利」, 可能忽略了家庭中的主要語言。其次, 作者要探討「不利」的說法是一種相對的觀點。

第二, 跨國婚姻家庭中的文化不對等: 跨國婚姻子女經常被類屬於「文化不利」, 甚至在教育部「教育優先區」的定義中, 跨國婚姻子女也屬於「文化不利」。但文化不利是從臺灣做為支配或主流文化社會的角度看待跨國婚姻家庭子女, 或更精確的說, 「東南亞或大陸配偶子女」, 但是我們卻很少將歐美國家等跨國婚姻子女視為文化不利。因此, 探討文化不利時必須分析社會或家庭界定的主流文化。

貳、「跨國婚姻」概念的精確化

臺灣的婚姻移民人口從1982年的全國全年127人，至1998年後大量增加，與外籍配偶結婚的人數共有8,625人，跨國婚姻的比例為7.13%，2003年達到最高峰（31.38%）（內政部戶政司，2004）。至2010年六月累計的外籍與大陸配偶人數已達436,556人（含已歸化、依親居留、長期居留、定居者），其中外籍配偶約14萬人、大陸（含港澳）配偶約29萬人。外籍配偶中，以越南籍最多（83,438人）、其次為印尼籍（26,686人），日韓等國家外籍配偶約4,000人，其他國家之外籍配偶共11,891人（移民署，2010）。2009年國人登記結婚之外籍與大陸港澳地區配偶，以大陸、港澳人士13,294人（占60.66%）較多，外籍人士8,620人（占39.34%），東南亞地區5,696人（占66.08%）其中又以越南3,651人最多，日本905人次之，美國805人居第三（內政部，2010a）。但從上述跨國婚姻的內外籍與大陸配偶人數仍以東南亞和大陸籍配偶為主，日韓、歐美等國家的外籍配偶人數僅佔3.68%。因此可以理解國內對於跨國婚姻家庭的討論仍以東南亞和大陸為主。不過也因此容易忽略少數非東南亞與大陸跨國婚姻家庭的類型。

內政部移民署對於「外籍配偶」的界定，主要依據立法院內政及民族委員會1999年審查內政部預算之附帶決議（內政部，1999）：內政部應積極規劃辦理外籍新娘生活適應及語文訓練，輔導其融入我國生活環境辦理並依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辦理。上述決議中仍以女性跨國婚姻者為接受輔導的對象。但依據《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畫》（內政部，1999）第三條有關輔導對象的規範，則為「包括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為未入籍之外國人、無國籍人、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或已入籍為我國國民而仍有照顧輔導需要者」，並不受限於東南亞和大陸跨國婚姻者。

臺灣外籍配偶現象的論述屬於「跨國婚姻」的類型，與歐美等研究討論的「移民」內涵仍有不同。歐美等主要的移民移入國，移民的形態以工作和勞動遷移為主，聯合國人口基金會（the United Nation Population Fund, UNFPA）指出，歐洲國家的勞動移民以高技術人才為主，女性移民主要因為勞動移民後的依親和團聚²，多數為拉丁美洲國家女性（UNFPA, 2006）。因此有部分國

²例如英國1997年就有超過八成的移民為女性和兒童，藉由申請依親和團聚的名義獲得永久居留權。美國1990年代，每年約有100萬的移民，合法移民中大約有七成是因為依親和團聚的緣故成為合法公民（OECD, 2000）。

際期刊討論的移民家庭，指的是全家皆為移民者的類型，³或是移民者後裔的家庭類型，臺灣的跨國婚姻家庭中，只有外籍配偶是移民，其他包含本籍配偶與子女皆為本國人，且臺灣移民者仍以婚姻移民為主，與歐美國家的工作或投資移民家庭本質上仍有不同。

談述外籍和大陸配偶（或稱「新移民」）時之所以常忽略英美等外籍配偶的跨國婚姻類型，乃因為英美等國的新移民仍為眾多外籍配偶中的少數，較不容易引起重視；其次，移民署外籍配偶輔導基金或者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均以東南亞和大陸配偶為主，而且服務女性新移民，少有提供給男性新移民的服務方案、亦未考量男性跨國婚姻者的需求。依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2010b），2009年共有9,853人歸化為中華民國國籍，其中98.1%為女性，且以越南籍配偶占78.3%居多，日本人歸化為我國國籍者有4人、韓國人有5人，歐美加地區國家則無人歸化我國國籍。國家政策中有關取得國籍須有識字課程的時數也不至於成為他們居留在臺灣的困阻，因為沒有取得國籍的需求，他們很少有語言和識字的動機。第三，在所有跨國婚姻的類型中，階級和種族因素依舊影響我們看待跨國婚姻的眼光，較少人會質疑英美國家的跨國婚姻類型是因為某種利益因素或經濟考量，但夏曉鵬（2009）指出，媒體將東南亞和大陸的跨國婚姻概化為買賣式的婚姻，這些嫁到臺灣的外籍女性大部分來自貧困家庭，其結婚對象多半為臺灣婚姻市場的挫敗者，媒體認為她們選擇嫁到臺灣是為了賺錢，他們的婚姻被簡化定義為「買賣婚姻」，在跨國婚姻家庭事件的報導上，採取病態化的角度呈現此一現象。這種「階層化的他者」（stratificationalized others）（藍佩嘉，2008）用以區隔代表弱勢階層的跨國婚姻家庭，此等將他們與我族區別的做法，影響我們對於不同跨國婚姻的態度，進而影響文化不利和語言學習困擾等研究的推論。

移民署外籍配偶輔導將「外籍配偶」定義為東南亞與大陸籍配偶，國內外籍配偶相關研究則仍以東南亞和大陸配偶為主，也較少見比較臺灣與歐美等國的跨國婚姻類型。檢閱國際論文，分析歐美白人和亞非國家的跨國婚姻類型，呈現的是在歐美國家的移民者如何適應歐美文化。例如，Driessen, Leyendecker, Scholmerich, & Harwood（2010）即探討18-36個月大的波多黎各移民幼兒面對美國文化和移民經驗的適應問題。臺灣跨國婚姻的特殊性是因為涵蓋了兩種不同的跨國婚姻型態——臺灣與東南亞移民的跨國婚姻型態，以及

³例如Bhandari（2006）討論的是加拿大男性移民社會適應的歷程；Smit和Driessen（2007）則探討丹麥社會中，移民家長面臨子女教育的問題。

臺灣與歐美國家移民的跨國婚姻型態。就臺灣作為移民接納國的角度，分別探討我們與歐美、以及我們與東南亞國家在語言和文化的不對等關係。

本文所稱之「外籍配偶」除了一般所認知的東南亞和大陸配偶以外，也涵蓋歐美等國的跨國婚姻類型。為了避免跨國婚姻、外籍配偶、移民等詞的混淆不清，除非引用的文獻以「外籍配偶」為探討對象，否則本文使用「跨國婚姻」一詞取代「外籍配偶」或「新移民」，以避免與國外移民家庭混用。

本文所談述與引用的深度訪談資料主要為國科會專題研究——「新移民21世紀的融合——男性新移民在臺灣的社會適應問題研究（I）」（葉郁菁，2010），作為論述語言和文化不對等議題時的資料佐證。

參、語言習得的不對等現象——不同種族的跨國婚姻比較

跨國婚姻家庭子女普遍有語言學習和學業競爭的問題。邱豐盛與鄭秀琴（2005）即指出，外籍配偶子女由於文化差異、經濟弱勢、語言適應、或家庭結構等因素，造成生活適應、學習動機低落、人際互動較差等問題。熊淑君（2004）則認為，跨國婚姻子女因為外籍母親的生活和情緒的雙重壓力，經常忽視子女的教養問題。教育部統計處（2005）「外籍配偶就讀國小子女學習及生活意向調查報告」研究結果指出，跨國婚姻子女課後超過三成上安親班，但也有高達近兩成的學童沒有人輔導。跨國婚姻家庭父母無法輔導子女的主要因素是父親忙於工作（佔34%）或母親的語言能力差（34%）。跨國婚姻家庭子女的語言學習落後，經常被歸因於與跨國婚姻的因素有關，不過「語言學習落後」所指涉的「語言」，與家庭中使用的主要語言有關。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子女在家庭中使用的語言可能是台語，歐美國家跨國婚姻子女使用的則是英語，他們都屬於跨國婚姻類型，且家庭中未必都以國語為主要語言，但東南亞跨國婚姻子女容易被貼上「語言發展落後」的標籤，歐美國家的跨國婚姻子女卻較少被質疑為語言發展落後。

91%的歐美國家跨國婚姻家庭期待子女學習雙語（包含外籍配偶自己國家的語言和國語或台語），55%的歐美國家外籍配偶在家與子女是雙語的溝通模式，有53%的東南亞外籍配偶希望子女除了會講國語、臺灣話，也希望他們的下一代會講自己國家的語言（泰語、越南話等），不過東南亞外籍配偶在家跟子女使用的語言卻多半以國語或台語為主（78%）（葉郁菁，2004a）。歐美

國家跨國婚姻家庭中認同雙語的重要性大於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此凸顯臺灣社會使用英語的優勢遠超過其他東南亞語言。這些家庭的子女得天獨厚擁有一位母語為英語的家長，讓他們在雙語的發展占有優勢。

葉郁菁（2010）訪談的英美跨國婚姻配偶大都以英語為家庭溝通語言，英美跨國婚姻者表示，他們幾乎不需要學習中文。因為他們在臺灣的工作（補習班的英語教師）幾乎不需要使用中文，即使在家庭中也以英語為主要語言，他們從英語報紙、網路或電視節目獲得相關訊息，而不用擔心看不懂中文的問題。英美跨國婚姻者結識來自同樣國家的朋友，他們聚會、聊天，但卻很少參與臺灣社群的實際生活，他們長期居留，卻從未考慮申請歸化國籍。甚至英美跨國婚姻者或其配偶也會期待他們的子女學習流暢的英語，因為英語被視為是一種「國際語言」、家庭中的「母語」，同時也受臺灣社會的尊崇。但越南話或印尼話卻很少被正視其在家庭或社會的重要性。英美跨國婚姻配偶生活在臺灣，但是使用的主要語言是英語，我們可以想像在這樣的跨國婚姻家庭中英語是優勢的、支配的語言，也是社會認可的重要語言，英美跨國婚姻子女很少被歸屬於「語言發展不利」，但這裏所指的「語言」是社會認可的英語。P. Bourdieu（1930-2002）（引自高宣揚，2002）指出，社會是一種語言的交換市場（linguistic exchange market），社會中的任何事件或活動，都無法離開語言的作用，語言扮演中介的工具，使社會中的個體產生互動。社會生活中的語言運用，反映了言說者的權力，不同的權力透過對話和語言的交換進行較量。跨國婚姻家庭中的語言使用，從Bourdieu的觀點分析，語言不僅是一種權力象徵，也反映了使用語言者在社會的位階，不僅在微觀的家庭互動中顯現言說者語言之不對等地位，也反映巨觀社會價值對該語言的尊崇。

漢斯（匿名）是男性跨國婚姻移民的另一個受訪者，他來自約旦，目前居住於台南（葉郁菁，2010）。漢斯的母語是阿拉伯語，家庭中主要溝通的語言是英語，因為漢斯擔任醫療工作的高級主管，所以在工作場域幾乎很少使用中文。漢斯堅持女兒應該要學會阿拉伯語，所以漢斯自己教女兒阿拉伯語，在漢斯家中，夫妻是用英語溝通、爸爸和女兒用阿拉伯語溝通、媽媽和女兒則是用中文溝通。漢斯太太表示，雖然先生期待她也必須學阿拉伯語，但是實在是「年紀大了、記不起來」。漢斯提到，當他們回到約旦時，女兒跟家人用阿拉伯話溝通無礙，讓他覺得很高興。即使在臺灣，阿拉伯語與越南或印尼語相同，皆不像英語般已經成為學校正式課程的一部分，阿拉伯語在臺灣使用的普遍性也不高，但是因為跨國婚姻父母的堅持，而讓跨國婚姻家庭的父/母國語

言學習得以實踐。不過，跨國婚姻者的母國語言在臺灣社會的重要性未必得到同樣重要的認定，或者跨國婚姻子女有機會可以學習外籍父母的母語。以東南亞國家越南和印尼為例，較少跨國婚姻者會主動教子女學習他們的母國語言，或有於家人的壓力不敢教子女越南語或印尼語。我們對於東南亞跨國婚姻子女「語言發展不利」的認定，多半基於以國語為唯一語言的立場，但卻忽略跨國婚姻子女在雙語（國語和外籍家長母語）以及三語（國語、台語、與外籍家長母語）的優勢。馮涵隸和梁綺涵（2008）探討台越跨國婚姻家庭時即指出，（台越）跨國婚姻子女出生在兩種文化與語言並存的家庭，理當接受雙文化和雙語言的社會化歷程，但迄今我們仍對跨國婚姻家庭中的雙語和雙文化發展的歷程了解有限。國外研究（Freeman & Freeman, 2003; Schechter & Bayley, 2002）也指出，即使在雙語的環境中，兩種語言的同時學習並未必是彼此干擾的負面效應。

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中學習越南或印尼語並不普遍，跨國婚姻家庭成員甚或社會的普遍價值均認為外籍女性應該學習中文、應該識字，才能迅速融入當地社會，這裡反映了以國語為優勢語言的主權意識形態。識字教育政策的規劃與推動將跨國婚姻女性視為子女教養的主要承擔者，因此有其必要性。內政部與教育部在「輔導外籍配偶補習教育、籌組民間團體及成立照顧輔導基金專案報告」提及：

語文訓練課程係目前外籍配偶教育最希望接受的教育課程，而因外籍配偶接受國民補習及識（中文）字教育，事涉渠等本國文化認同及教養子女，故如何促其受教學習，實是現今最迫切的需求。（內政部、教育部，2004：3）

但是許多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卻很少允許外籍女性以媽媽的語言與子女溝通，臺籍丈夫對跨國婚姻妻子的語言和文化興趣缺缺（馮涵隸、梁綺涵，2008），作者認為這與東南亞或大陸女性在跨國婚姻中受壓抑的社會地位有關，此外，是否要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子女學習東南亞語言，也充滿爭議。一方面，許多跨國婚姻家庭仍期待子女可以從獲得教育資源和學歷之後可以有機會向上流動，越南或印尼語言的學習無法看到即時的效益，即使學習了越南語言也未必使他們的子女可以獲致更好的教育機會，學習媽媽國家的語言因此容易被忽略。跨國婚姻子女的語言學習需要再從兩個層面解析：

第一、誰該決定跨國婚姻子女的語言學習？在此議題的論述上，不論學者的倡議或政策的規劃，這些談述過程中很少聽見跨國婚姻女性的聲音，當學者從多元文化的角度，強調應該讓跨國婚姻子女學習母親國家語言，但母國語言的學習是否是跨國婚姻女性所期待的？或者推動的過程是否跨國婚姻家庭成員（包含丈夫與夫家人）可以接受或認同學習母親國家語言的重要性？如果跨國婚姻的家庭成員無法覺知學習母親母語的價值和重要性，這樣的課程活動很可能淪為形式化的要求跨國婚姻子女學第二外語，最後仍不易達到多元文化的理想效益。語言學習並非從旁觀者的角度為他們做決定，當我們要求或規劃跨國婚姻子女參與東南亞語言的學習課程時，這樣的語言學習是否符合跨國婚姻家長的期待？教育單位鼓勵小學推動外籍家長母語課程的立意、課程內容的規劃、設定的學習目標、未來預期達到的效益，則應該超越教導跨國婚姻子女第二外語的表面意義。

第二、語言的習得原本就應該在自然的情境中學習和發展，如同上述阿拉伯回教跨國婚姻家庭中，跨國婚姻家庭子女的母/父國語言學習並非透過制式化的課程教學，而是在家庭生活的溝通中自然衍生。當政策規劃者誤以為推行越語課程是多元文化的展現，並且期待制式化或課程化的越南語教學可以使跨國婚姻家庭子女越南家長的母語當成第二外語學習如果越南語的學習只是一種純粹的課堂活動而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又讓母國語言的學習落入為學習而學習的謬誤之中，越南語課程的學習反成為加諸於跨國婚姻子女的負擔。但是馮涵隸、梁綺涵（2008）指出，在不涉及臺灣人的親子專屬私密空間裡，越南籍媽媽對子女使用越語反而展現相當的堅持。在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中，兩種語言和文化並沒有對等的地位和份量，其結果使得外籍家長母語的傳承缺乏足夠的施展空間。Curdt-Christiansen（2009）探討加拿大魁北克的中國移民家庭，並分析家庭中使用中文、英語、和法語的歷程，發現家長對於語言學習的認知，影響移民父母對其子女語言使用的偏好。家庭中的語言使用，與社會政治和經濟因素有很大的關連性。同時，家長的教育背景、移民經驗，以及文化偏向（cultural position），也會影響家長對於子女語言學習的期待。雙語或三語的語言優勢必須在跨國婚姻家庭成員覺知和共識的狀況下，從生活當中實踐和傳承，並且讓越語、印尼話、或者其他國家的語言成為日常生活對話的一部分。語言應該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刻意製造出來的教學活動，第二母語的學習應該像歐美跨國婚姻家庭中使用英語一樣自然，而非刻意在一個課程活動中的加強式教學。

肆、跨國婚姻家庭中的文化不對等

《教育大辭書》（國立編譯館，2000）定義出「文化不利」的概念為：指貧困家庭子女由於父母教育或是生活經濟水準不高，缺乏適當教養，不僅基本學理常識不能獲得，也無法建立符合社會文化要求的行為規範，因此入學後，學業表現與生活適應都比一般學童困難、學習較緩慢、語言發展亦較落後，因而失去在學校可能發展的機會。因此，不僅物質環境貧困，文化環境如語言習慣、價值觀、態度、知識、習性等也有不利的影響。教育部（2007）「教育優先區計畫」指標中的第二項亦將跨國婚姻子女之學生比率偏高之學校列為「教育優先區」的條件之一。由上述定義可以窺知，因教養者的教育程度和經濟能力不足、或者跨國婚姻的文化適應弱勢家庭，均被歸屬於文化不利的類別。

文化不利學童的形成與所處的外在環境因素有極大關聯，其中家庭背景因素更是影響學童學習態度的重要指標。高德義（2000）認為，文化不利兒童社經地位低、經濟生活貧困，父母教育價值觀、教育態度與方式等，對子女之學習有負面影響，再加上單親、失親及隔代教養普遍，對兒童教育極為不利，在學習上文化不利兒童可能會面臨許多學習困擾，影響其學習動機，使成績不佳，形成自卑感，造成輟學率高及低教育成就。跨國婚姻家庭子女若處於文化刺激較少的環境，或缺少語言學習楷模，加上家庭對於子女學習的不重視，都可能導致學習動機低落。葉郁菁（2004b）比較東南亞外籍配偶、大陸配偶、與歐美與其他國家三種類型外籍配偶家庭在子女教育花費支出的項目，結果發現：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在子女的支出項目以基本的生活花費最高，這與東南亞的跨國婚姻家庭平均的經濟收入較低有關，因此跨國婚姻家庭必須把較多的收入用於基本的生活照顧。歐美等國家的跨國婚姻家庭在教育費用的支出明顯高於東南亞與大陸跨國婚姻家庭，尤其在圖書玩具、子女的教育費補習費、以及提供子女娛樂等花費，遠超過大陸與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由此可知，家庭經濟狀況和外在社區環境可能成為孩子能否接收豐富的文化刺激的關鍵因素。教育部（2005）的統計資料顯示，家庭富裕的跨國婚姻子女在學校的適應力比小康家庭和清寒家庭之跨國婚姻子女佳，顯見家庭可以直接挹注的教育資源與家庭經濟狀況有關。

許多論述採取結果論的觀點，將跨國婚姻子女學業成就表現不好直接歸結是（尤其是東南亞）母親的語言問題、適應不良、文化差異衝突、較少的親職

參與等，如吳金香、張茂源、王昇泰（2007）從兒童學習權觀點談「新住民子女」的教育問題言，母親的文化背景或國籍在變項的操作下，成為影響子女學習的主要關鍵；陳清花（2004）比較澎湖縣東南亞籍與大陸籍外籍配偶子女的學業成績表現後，指出母親的華語能力對子女的學業成就有影響。不過，母親必須擔負子女的課業學習指導，推論子女的學習不佳乃受母親文化背景的影響，但實際上大多數跨國婚姻女性因為無法看得懂子女的課業，因此多半委由他人代為指導其子女的學業。上述推論可能還有另一個問題，即將子女的學習和母親綑綁成單一因果，忽略家中其他重要他人的影響；其次，學習成就圈限在符合臺灣教育和考試制度的學業或考試成績狹隘化的定義，而未認可正式學校以外涵納多元智能之藝術、體能、人我關係等的學習。跨國婚姻子女在認知課業的表現未盡理想，並不表示他們在藝術創作、體能、甚或多元文化知識的理解也較弱。

所謂「文化不利」乃基於我們是文化的宗主國的優勢位置看待，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被視為文化不利家庭，因為跨國婚姻中的母親是越南或印尼等東南亞籍，我們理所當然推論其子女處於文化不利的情境，此乃將將文化不利直接等同於子女的學習不利，卻很少考慮跨國婚姻家庭擁有多元文化發展的優勢，即使母親是移民者，但其子女仍為中華民國國民，且他們生活和學習的情境與一般臺灣家庭子女並無差異。上述文化不利的論述還存在文化差異。從文化相對優越性來看，臺灣社會普遍認同歐美國家的文化優於臺灣，學校教育強調的國際化或者國際教育，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種以英美語系少數國家為主的寡眾文化，而非包容各種不同國家與文化特徵的多元文化（葉郁菁，2005）。葉郁菁（2010）指出，歐美國家跨國婚姻者的生活習慣以英美文化為核心，不論在飲食或生活習慣，臺灣文化在英美跨國婚姻家庭中顯得格格不入。例如，葉郁菁（2010）訪談英國的跨國婚姻者Hugo（匿名）即指出，他很難接受太太在家看臺灣連續劇，尤其是「娘家」。Hugo說：「他們（劇中人物）罵來罵去、很吵，我很不喜歡我的小孩看那種節目，但是我知道，我太太都偷偷的看」。Hugo以「偷偷看」來稱述太太違反支配文化的行為。在英美跨國婚姻家庭中，不但中文和台語是被邊陲化，同時臺灣的俚俗文化也很難被肯認其存在的價值。由此看來，文化不利是基於我們對於東南亞和歐美等不同文化和種族的主觀差別認定，或者社會階級才是真正的影響因素，但因為跨國婚姻的明顯標記，才導致我們對文化不利產生誤解。

就國家教育的角度，當跨國婚姻子女因為家庭社經地位因素在語言能力和

學習產生落差時，應該協助所有學童（並非只針對跨國婚姻家庭子女）改善他們的學習狀況，不是因為他們來自跨國婚姻家庭，就必然屬於文化不利家庭，文化不利家庭子女，必定需要語言和教育學習的介入。這是單一而簡化的邏輯思維。學校教育者以東南亞外籍家長的語言和文化背景，認定他們無法提供子女良善的語言學習的楷模，所以建議必須加強子女的課業輔導；因為他們對臺灣文化的理解不足，建議他們必須參加識字班、增強親職功能等，這些皆從優勢文化的高度看待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認為她們必須融入主流社會，缺乏臺灣社會對多元文化的省察或接納。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美語仍是主要的世界語言，透過英美國家的文化媒介，我們對英美主流文化有比較完整和清楚的概念，但對於非世界主流國家的語言和文化卻所知有限，如同多數人熟知西方的聖誕節和萬聖節，並且蔚為世界潮流，但英美與世界多數國家卻對泰國的潑水節、中國端午節的理解相對有限。歐美外籍配偶與東南亞外籍配偶均為跨國婚姻移民，但是同為外籍人士，臺灣社會可能質疑東南亞跨國婚姻者的子女有「文化不利」的問題，但卻很少質疑歐美國家跨國婚姻者的子女有「文化不利」問題。當東南亞媳婦要學習臺灣風俗、上生活適應輔導班時，她們在家庭中就有很好的文化導師，不管是她們的家人或者電視連續劇，隨時都在教導她們臺灣的文化。反觀歐美跨國婚姻者，他們生活在歐美文化的封閉生活中，維持原來的生活習慣（如Hugo說他下班後的興趣就是跟他的美國朋友去Pub喝酒聊天），甚至可以掌控或決定家庭中對某種文化的偏好。當我們從文化對等的角度思考，文化只有差異沒有優劣，也就沒有所謂「利」與「不利」的差別，由上述討論亦可得知，在沒有分析家庭背景因素下，將跨國婚姻子女的學習落後直接推論與母親文化背景有關，不僅缺乏足夠的證據支持，同時也忽略歐美跨國婚姻與東南亞籍跨國婚姻家庭在家庭中的文化不對等關係。

伍、結語

臺灣社會有越來越多跨國婚姻家庭時，應該樂見的是臺灣社會可以因為涵納多元性而更加豐富，而不是對跨國婚姻家庭在語言和文化學習的質疑和擔憂。如果我們對於跨國婚姻家庭存有上述疑慮，那應該對東南亞和大陸跨國婚姻家庭以及歐美跨國婚姻家庭都存有一致性的觀點，而實際上，歐美跨國婚

姻者不論語言的使用或者文化的適應，都不曾面對類似東南亞跨國婚姻者的問題。本文認為此乃對跨國婚姻子女語言學習和文化不利的標籤化，也反應以臺灣主流社會文化和國語為依歸的霸權心態。本文試圖在語言不對等的論述中回答為什麼在歐美跨國婚姻家庭以美語為主、但在東南亞跨國婚姻家庭中卻不能講越南話或印尼話？從Bourdieu的觀點析論，社會生活中的語言使用反映的是語言本身的權力關係。歐美等移民接受國本身作為權力核心國家，其移民多半來自亞非或中南美洲等較為邊陲化的國家，這些移民者的語言和文化在歐美是少數的、相對弱勢的，他們探討弱勢的移民者在語言和文化適應問題，但卻沒有機會可以討論移民國家面對優勢或主流文化和語言時的型態。正因為臺灣社會同時存在歐美與東南亞跨國婚姻類型，使得語言優勢或權力關係的比較更為清晰。英文相對於中文是優勢、而中文相對於越南語或印尼語是優勢，這種語言不對等反映的是語言背後代表的國家或文化的強權或者（男性）性別的優勢地位。其次，跨國婚姻第二父/母國語言的學習應該是自然習得的過程，如同英美和約旦的跨國婚姻者，他們的子女在家庭中自然學會美語和阿拉伯語，但是反觀越南跨國婚姻子女，在家庭中很少有機會學習母親的越南話。當越南語言的學習成為一種正式課程，必須透過制式化的教學活動，讓一群東南亞跨國婚姻子女坐在教室內學習，這樣刻意的、形式化的安排，若沒有跨國婚姻家庭成員的支持，很難看到長期的效果與對跨國婚姻子女的實質效益。

以外籍配偶或外籍勞工身分來台定居的東南亞國家人民，在臺灣社會中受到不平等對待，認為他們的文化是次等、落後的，對於東南亞新移民母親的描述，則憂慮她們的語言和文化衝突無法適當的教養子女。社會中對於不同跨國婚姻的看法仍存在差異；但相對的，我們很少質疑歐美國家的跨國婚姻家庭文化不熟悉或較弱的中文能力影響其子女的學習，反而認可跨國婚姻家長教導子女父/母國語言，讓子女有機會學習不同文化，和擁有婚姻移民者母語的雙語或三語優勢。但是對於東南亞或大陸的跨國婚姻家庭，則抱存文化不利的先入為主偏見，甚至在家庭中越南或印尼的語言是不受到認可和尊重的，在日常生活中無形的影響了我們對於不同文化的認知與態度，形成對東南亞文化的不公平對待。文化之間具差異性但並無優劣之分，因此對跨國婚姻家庭就不應該有不對等的描述。

即使臺灣整體社會人口結構面臨轉變，成為多元的移民社會，但是社會中對於不同文化的尊重、接納與包容性卻仍然不足，對於歐美國家的移民者甚為尊崇，卻仍以優勢文化的心態看待東南亞文化。這些思維模式顯見主流社會的

霸權心態仍然存在，認為他族融入是唯一方式，未考量外籍配偶原生國文化，以文化同化論的心態要求這群新移民了解、適應與融入臺灣社會，忽略他們帶入臺灣社會的文化條件、特質與生命經驗。即使是主流社會的民眾也必須學習接納與尊重不同外籍配偶的母國文化，重新檢視在社會論述脈絡中，我們對於東南亞與歐美不同跨國婚姻家庭存有的意識形態差異。

參考文獻

- 內政部（1999）。**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畫**。臺北市：作者。
- 內政部（2010a）。**2010年第3週內政統計通報（98年國人結婚登記之外籍與大陸港澳配偶人數統計）**。2010年5月10日，取自www.moi.gov.tw/files/news_file/week9903.doc
- 內政部（2010b）。2010年第十一週內政統計通報。**2009年我國國籍之歸化、喪失、回復及撤銷喪失情況**。2010年8月10日，取自http://www.moi.gov.tw/chi/chi_news/news_detail.aspx?sn=3935&type_code=01http://www.moi.gov.tw/stat/news_content.aspx?sn=3748&page=2http://www.moi.gov.tw/stat/news_content.aspx?sn=3935
- 內政部、教育部（2004）。**輔導外籍配偶補習教育、籌組民間團體及成立照顧輔導基金專案報告**。2010年5月10日，取自www.immigration.gov.tw/outweb/ch9/f9a-38.doc
- 內政部戶政司（2004）。**內政統計通報，2004年第六週**。2005年2月3日，取自 <http://www.moi.gov.tw/W3/stat/week/week06.doc>
- 吳金香、張茂源、王昇泰（2007）。從兒童學習權觀點談「新住民子女」的教育問題。**學校行政雙月刊**，**50**，269-281。
- 邱豐盛、鄭秀琴（2005）。正視「新移民女性」的學習及教養問題。**教師天地**，**137**，67-72。
- 夏曉鶯（2009）。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以臺灣的「外籍新娘」現象為例。載於夏曉鶯（主編），**騷動流移**（頁73-114）。臺北市：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高宣揚(2002)。布爾迪厄。臺北市：生智。
- 高德義(2000)。原住民教育的發展與改革。載於張建成(主編)，**多元文化教育：我們的課題別人的經驗**(頁3-41)。臺北市：師大書苑。
- 國立編譯館(2000)。教育大辭書(二)。臺北市：景文。
- 教育部(2005)。外籍配偶就讀國小子女學習及生活意向調查報告。臺北市：作者。
- 教育部(2007)。教育部97年度推動教育優先區計劃。臺北市：作者。
- 教育部統計處(2005)。外籍配偶就讀國小子女學習及生活意向調查報告。臺北市：教育部。
- 移民署(2010)。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2010年5月10日，取自[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9903/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xls](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9903/外籍配偶人數與大陸(含港澳)配偶人數.xls)
- 陳清花(2004)。澎湖縣新移民女性子女學校學習之探討。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 陳曉琴(2008)。馬祖地區國民小學外籍配偶子女學習適應與學業成就之研究。銘傳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馮涵隸、梁綺涵(2008)。越南媽媽·臺灣囡仔：台越跨國婚姻家庭幼兒社會畫之初探。**臺灣人類學刊**，6(2)，47-88。
- 葉郁菁(2004a)。國際婚姻家庭的新文化適應——東南亞、大陸與歐美外籍配偶家庭的比較：以臺南市為例。**兒童及少年福利期刊**，7，85-102。
- 葉郁菁(2004b)。臺南市外籍配偶家庭暨子女生活狀況與福利需求調查研究報告書。臺南市：臺南市政府。
- 葉郁菁(2005)。文化理解與國際教育課程在學前教育階段的實施。**教師之友**，46(4)，38-43。
- 葉郁菁(2006)。從英國「穩固開始」計畫談外籍配偶子女的教育輔導。**教育資料與研究**，69，285-292。
- 葉郁菁(2010)。新移民21世紀的融合——男性新移民在臺灣的社會適應問題研究(I)。國科會研究計畫成果報告(NSC 98-2621-M-415-001)。嘉義縣：國立嘉義大學幼兒教育學系。
- 熊淑君(2004)。新移民女性子女的自我概念及人際關係之研究。國立臺北師範學院教育心理與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臺北市。
- 聞遠苓(2010)。東南亞外籍配偶生活適應及家長參與子女學習之研究——以

- 台中縣市越南及印尼配偶為例。中國文化大學生活應用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北市。
- 蔡旻芳（2009）。台南縣外籍配偶子女與本國籍子女學習適應差異之研究。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臺南市。
- 藍佩嘉（2008）。*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臺灣新富家庭*。臺北市：行人。
- Bhandari, B. S. (2006). Choices and voices of immigrant men: Reflections of social integration. *Canadian Ethnic Studies*, 38(1), 140-148.
- Curdt-Christiansen, X. L. (2009). Invisible and visible language planning: Ideological factors in the family language policy of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 Quebec. *Language Policy*, 8(4), 351-375.
-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Skills (2003). *Aiming high: Raising the achievement of minority ethnic pupils*. London: DfES.
- Driessen, R., Leyendecker, B., Scholmerich, A., & Harwood, R. (2010). Everyday experiences of 18 to 36 month-old children from migrant families: The influence of host culture and migration experience.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180(9), 1143-1163.
- Freeman, Y., & Freeman, D. (2003). *Between worlds*.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 Hammer, C. S., Farkas, G., & Maczuga, S. (2010). The language and literacy development of head start children: A study using the family and child experiences survey database. *Language, Speech, and Hearing Services in Schools*, 41, 70-83.
- OECD (2000). Immigrat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Problem or solution? *Prospect Magazine*, June 2000 / OECD Observer No 221-222, Summer. Retrieved May 10, 2010, from: <http://www.oecdobserver.org/news/fullstory.php/aid/337/>
- Pickstone, C., Hannon, P., & Fox, L. (2002). Surveying and screening preschool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community-focused intervention programmes: A review of instruments. *Child: Care, Health & Development*, 28(3), 251-264.
- Schechter, S., & Bayley, R. (2002). *Language as cultural practice: Mexicanos en el norte*.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Smit, F., & Driessen, G. (2007). Parents and schools as partners in a multicultural, multireligious society. *Journal of Empirical Theology*, 20, 1-20.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 (2006). *Migration in brief: Europe*. Retrieved May 10, 2010, from: www.unfpa.org/swp/2006/presskit/docs/factsheet_europe.doc